

山西潞城明代《礼节传簿》的发现与研究

李 玉 莲

山西是华夏文明的发祥地,据说炎帝就诞生在它的南隅上党。战国时期,秦赵两国曾在这里摆开战场,进行了著名的长平之战。只会纸上谈兵的赵国大将赵括,不仅自己中箭身亡,还致使赵国40万将士被坑杀。时间已过去了两千两百多年,生活在那里的人们,却无法忘记那场战争的血腥。他们天然地具有一种历史的自觉,至今古风犹存。那里的民间流行一种以酬神娱人为目的的“迎神赛社”活动。这些活动,拥有一整套的极其严格的礼仪规定,以文字的形式被传抄、保存在当地的堪輿家手里或神庙之中。这些文字的记录,保留了许多弥足珍贵的民间音乐、舞蹈、戏曲、民俗、宗教等资料。它的发现,使文学史,尤其是戏剧史上的一些问题有了研究解决的史料依据,同时也为文化史、艺术史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资料佐证。

一、上党遗风

二十世纪以来,学界于海内外发现了一大批文学史料,其中许多发现极其偶然,甚至颇有传奇色彩。譬如敦煌莫高窟辉煌与耻辱相叠加的发现史,又譬如《脉望馆钞校本古今杂剧》的现身于书市。《礼节传簿》(以下简称《传簿》)古抄本的发现则既非偶然,又乏传奇性可言,它是山西的戏剧工作者执著调查收集的结果。八十年代

中期,上党戏剧院的栗守田、原双喜,为了配合《中国戏曲志·山西卷》的编纂工作,搜集到了一批由民间乐户演出的“队戏”、“院本”、“清戏”和“前行赞词”。这些戏曲史料的发现,得到了省、地(市)文化主管部门的重视。为抢救戏曲艺术遗产,保护戏曲文物,1985年10月,山西省文化厅录音录像室、山西省戏曲研究所和山西省上党戏剧院联合举办了上党地区传统剧目仿古演出录音录像。同时邀请了张焕、张万一、邓焰等几位老年戏剧家和中国戏剧研究院的寒声做顾问,还邀请了一些老艺人、老乐户和参与过迎神赛社的老堪輿家参加这一活动。录像期间,山西省戏剧研究所负责搜集戏曲文物的常之坦,不失时机地向老艺人、老乐户、老堪輿家作调查。他得知潞城县崇道乡南舍村曹占标家存有史料,但由于曹家是堪輿世家(俗称阴阳先生),历次“运动”挨整,思想顾虑重,不肯示人。后经原双喜屡做工作,常之坦又与之建立了友谊,并保证他绝不会因此受累,曹占标方把家中保存了四百余年的《传簿》(全称《迎神赛社礼节传簿四十曲宫调》)手抄本拿出来。常之坦发现《传簿》中有“正队”、“附末院本”等记载,便拿去让邓焰、张焕看,他们将有关剧目做了摘录,随后,山西省戏研所所长杨孟衡和上党戏剧院栗守田,也分别做了摘录和全抄。经邓焰介绍,1986年元宵节,上党戏剧院的同志带寒声到南舍村看了原本。

南舍村的曹占鳌(乳名满金,1908年生)、曹占标(乳名双枝,1925年生)兄弟,出生于堪輿世家。从他们上溯二十二代祖曹震兴,于明中叶充当阴阳官始,历代均操此业。明万历二年,曹震兴之孙曹国宰(现竖立在该村玉皇庙的明崇祯十年重修庙宇石桥碑背面,就有“阴阳曹国宰”刻字)从南贾村将此《传簿》转抄至曹家。由于职业的需要,视之为传世之宝。曹氏兄弟的五世祖曹焕新,还曾悬挂过“盛世耆宾”匾额。南舍村有一传说,每五年举行一次赛社活动,可保全村男女平安。因此,每逢赛年,全村所有成年男子一律参加。曹氏兄弟担任该村赛期祀神的唱礼生与台下科头(负责人)。堪

與家曹满金则不但办村赛(俗称“调家龟”),还要主办“官赛”。所以《传簿》实际上是他们的衣食之源,它的历经劫难而能被卷在棉絮中保存至今,便不难理解了,也实在是学界的一大幸事。1986年5月中旬始,寒声与栗守元、原双喜、常之坦一同对《传簿》进行整理注释。其成果《〈迎神赛社礼节传簿四十曲宫调〉注释》发表在1987年4月出版的《中华戏曲》第3辑上,同期刊载了《传簿》抄本的全文影印本。至此,流传于上党民间四百年之久的一部具有较高文学史料价值的古文献,终于公诸于世。

二、酬神娱人

《礼节传簿》手抄本原件长23.3厘米,宽14.5厘米,麻纸无格,毛笔楷书竖写。半叶8行,全抄本共24全页,约两万余字。线装封面靠书口书签外,竖写“万历二年正月十三日抄立”。右下方靠近线装针眼处,写“选择堂曹国宰志”。根据抄本纸张、墨色和开篇初写时习用明代中叶刚脱离软体、字形方正的书写特点,经古籍专家鉴定,确系明代抄本。

迎神赛社是流行于上党地区的祀神活动,与一般的村社节日社火赛会不同,它有乐户、堪輿家例行的一套礼仪程序和“神戏”演出规定。迎神赛社活动有“官赛”和“调家龟”两种形式。“官赛”又称“大赛”,是围绕一座神庙,由许多村社联合举办的。一般来说是每年举办一次。具体组织赛社祭祀的“科头”由堪輿家充任,其演出节目由乐户承担。“调家龟”亦称“小赛”,是由一个自然村的村民自行举办的,除请一些乐户协助排戏和演奏外,演员皆由本村成年男子充任。如曹氏兄弟所在的南舍村,便每隔五年举行一次这样的赛事。《传簿》便是堪輿家组织迎神赛社活动的依据。

《传簿》内容可分为四部分:第一部分叙八位星君分掌八种乐器;第二部分叙汉光武帝以二十八星宿、四斗星及其它八星为序册封东汉48位开国之将;第三部分分叙二十八宿值日时,即祭祀二

十八宿神时的礼仪规定。这里的二十八宿神已是自然神与人格神的复合体。这些礼仪规定,包括以人装扮二十八星宿神的扮相,如面貌、发型、衣着、手持、站向等;供盞过程中演出的音乐、歌舞和队戏;祭祀后于舞台上演出的正队戏、院本和杂剧的排场程序。第四部分是25个乐舞“哑队戏”的角色排场单。其中第三部分开列了47个大曲“曲破”、宋词曲、金元俗曲曲名和174个剧目名称。在这174个剧目名称中,有杂剧名目26个,院本名目8个,正队戏名24个,叙事曲破、叙事歌舞队戏名115个。这些剧目有一部分存在于宋杂剧、金院本、元杂剧、南戏之中,约占总数的三分之一;另一部分则是新发现的剧目,约占总数的三分之二。根据《传簿》所记载的赛社演出剧目来看,从歌舞队戏到院本,到杂剧,到南戏传奇,无所不包,三天的赛期便走完了戏剧史千年的里程,因此不妨说它是中国戏曲史的巡礼。

三、古 剧 巡 礼

任何关于历史的研究都是以占有资料为前提的,文学史的研究也不例外。以往,由于史料的缺乏,学界对文学史,尤其是戏曲史的许多问题不甚了然。《传簿》则为一些问题的解决提供了史料。

《传簿》所录剧目可分为两大类:第一类为末盞供酒后在舞台上演出的正队戏、院本、杂剧三种。这是祀神的正宗戏,剧目都相当古老。第二类系四至六盞供酒中在献殿中演出的剧目,称供盞队戏或哑队戏。这部分剧目中出现了一部分南戏。这些剧目显示了中国古代戏曲从产生到发展各个阶段的面貌,是古老的民间队戏与金院本、元杂剧,乃至南戏、传奇叠加在一起的文物堆积层,为考察古代戏曲的发展及南北曲的交流提供了多方面资料。它证明明前期剧坛并不寂寞,各种戏剧形式的创作演出并没有停滞和中断。其关于院本的记载,尤其是其所保存的两个口述本金院本,使前此的学者只能从元杂剧和宋代戏文中寻找院本遗迹的情况得以改观。

关于队戏的记载，则勾勒出了一一种古老的戏剧形式的轮廓。剧目记录之外，《传簿》还较详细地记录了明代中叶北方农村迎神赛社的礼仪和规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宗教、民俗和戏曲演出的联系。因此它在文化史上的地位，也是不容忽视的。

《传簿》古抄本不仅是研究上党地区音乐、歌舞、戏曲史的重要资料，也对研究我国古代民间歌舞、戏曲史，民间与宫廷乐舞、民间与宗教祀神驱傩乐舞的相互关系，词曲体歌舞、戏剧在民间的演变，提供了重要的史料和线索。

四、填补空白

《传簿》一经出现，立即因其所具有的史料价值引起了学界重视。中国戏剧院的寒声、山西省戏剧研究所的常之坦、上党戏剧院的栗守田、原双喜等倾力做了认真细致的注释工作，为以后的研究奠定了基础。寒声等还于《中华戏曲》第3辑发表了《〈迎神赛社礼节传簿四十曲宫调〉初探》一文，介绍了《传簿》之所以流传至今的一些背景资料，如上党地区以酬神许愿、驱疫逼邪、祈福禳灾为目的的赛社传统、舞楼建筑等。认为《传簿》关于队戏、院本的记载有填补戏曲史空白的作用。黄竹三、张之中等亦于同期发表了关于《传簿》的研究文章。他们以戏剧发展史为研究视角，将《传簿》所记录的剧目与现存或存目宋杂剧、金院本、元杂剧、南戏等作了比较，发现《传簿》中有相当多的剧目源于早期北方戏曲金院本和元杂剧，与南戏的关系则相对疏远，并由此而判定《传簿》所载剧目基本是北方戏曲，传奇之风至明中叶似乎尚未占领北方舞台。另有一百多个剧目是不见于戏剧史籍记载的新发现剧目，其中有一些为后世所盛演，使那些原本被认为是地方戏勃兴后才创作的地方剧目亦有承继了。对《传簿》中有关队戏、院本的记载则进行了更细致的研究。队戏是一种比较初级的戏剧形式，是院本、杂剧未登台时的民间祀神戏。它不仅有舞蹈，而且装扮人物，有简单的故事情节，演

出不限于舞台，元杂剧很可能即脱胎于此。院本是十一世纪在金邦统治地区流传的一种戏剧形式。金元之后，杂剧盛行，院本遂至湮没。学者只能见到元末陶宗仪《辍耕录》中的存目和其它文献中的一些零星记载。《传簿》的记载则不仅证明院本演出直至明中叶仍在民间流行，且提供了两个保存金院本遗制最多的口述本，研究者便由此而考察出院本的内容及演出特点。对《传簿》所记录的“哑队戏”亦有专人研究，认为其与“队戏”一样是地方戏的先声。

赛社是一部运动着的戏曲史。《传簿》之中，首先是以人装扮二十八宿神，颇得上古以“尸”祭祀天地百神之遗意，正合王国维的戏剧萌芽于尸灵职分说。其后的供盞演出的礼节程序，也正是戏剧的形成过程。它包括六个层面的节目：音乐歌唱、队舞曲破、队戏、宋金杂剧院本、元杂剧、明代杂剧和传奇，几乎具备明中期以前古代戏曲的全部种类，也正反映出戏剧萌芽、发展、成熟、繁荣的过程。

关于《传簿》的研究还只是一个开端。其研究尚囿于戏剧史的范围之中，且着重于宏观的发展，即从歌舞队戏直至南戏传奇的发展演变关系的研究。或者研究者们将会从《传簿》中发掘出更多更有价值的资料，进一步充实戏曲史之研究。《传簿》保存的史料并非仅限于戏剧，它涉及到音乐、舞蹈、宗教、民俗等许多方面。因此，从文化史、艺术史、宗教、民俗的角度研究《传簿》也是十分必要的。此外，对《传簿》之研究已成为从民间艺术中发掘史料的良好开端。继1985年《传簿》发现之后，1989年又在其附近的长子县大关村发现明清时期祭神仪式抄本14种。它们记录了当地明清时期民间祭神活动和戏曲演出活动的足迹，已有学人对其进行注释研究。由此而引发的对其它民间戏曲等民俗文化的研究也在进行之中，如对山西雁北赛戏、饶鼓戏的研究。可以预见，这类研究将会在时间、地域、内容等方面得到拓展与深入。

参考文献

1. 曹占鳌、曹占标珍藏:《〈迎神赛社礼节传簿四十曲宫调〉明万历二年手抄本影印》,《中华戏曲》,1987年4月第3期。
2. 寒声等:《〈迎神赛社礼节传簿四十曲宫调〉注释》,《中华戏曲》,1987年4月第3期。
3. 寒声等:《〈迎神赛社礼节传簿四十曲宫调〉初探》,《中华戏曲》,1987年4月第3期。
4. 黄竹三:《我国戏曲史料的重大发现——山西潞城〈礼节传簿〉考述》,《中华戏曲》,1987年4月第3期。
5. 张之中:《队戏、院本与杂剧的兴起》,《中华戏曲》,1987年4月第3期。
6. 窦楷:《试论“哑队戏”》,《中华戏曲》,1987年4月第3期。
7. 冯俊杰:《赛社:戏曲史的巡礼》,《中华戏曲》,1987年4月第3期。
8. 任光伟:《赛戏、饶鼓杂戏初探》,《中华戏曲》,1987年4月第3期。
9. 廖奔:《〈迎神赛社礼节传簿四十曲宫调〉剧目内容考》,《中华戏曲》,1988年12月第7期。
10. 廖奔:《〈迎神赛社礼节传簿四十曲宫调〉剧目内容考(续)》,《中华戏曲》,1989年5月第8期。
11. 张之中:《中国古代戏曲的南北交流——〈礼节传簿〉探索之二》,《中华戏曲》,1989年5月第8期。
12. 徐扶明、徐循行:《〈礼节传簿〉剧目补考》,《中华戏曲》,1993年8月第13期。
13. 梁作腾:《山阴县的“赛赛”情况》,《中华戏曲》,1993年8月第13期。
14. [日本]矶部彰:《关于〈礼节传簿〉中的〈西游记〉队舞戏》,《中华戏曲》,1991年4月第10期。
15. 班书友:《谈谈我对“供盞队戏”部分曲目的浅见——读〈礼节传簿〉》,《中华戏曲》,1991年4月第10期。
16. 廖奔:《晋东南祭神仪式抄本的史料价值》,《中华戏曲》,1993年8月第13期。

作者工作单位: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 97 博